



# 关于夜郎文化的多元性



宋先世

(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摘要:**本文主要讨论关于对“夜郎文化”的不同认识及概念,从不同的视角来看待夜郎文化,区分地方历史文化与考古学文化的异同,强调从不同的学科和方向全面立体地来研究分析该文化。

**关键词:**夜郎,夜郎文化

**Abstract:** The article discussed mainly about the different understanding and the concept of "Yelang Culture", regarded Yelang Culture from the different angle of view, distinguish between the local historical culture and the archaeology culture, and stressed to comprehensive three-dimensional research and analyze this culture from different disciplines and directions.

**Key words:** Yelang, Yelang Culture

夜郎之名,始见于两千余年前的史志所载,而“夜郎文化”一词的见诸文字,则是近二三十年来的事。其间以贵州本土为主包括邻近省份部分地域内的大批专家学者,立足于不同的学科、从不同的侧面、运用不同的研究方法和体系,透过不同的视野,对“夜郎”及“夜郎文化”进行了不同程度的审视和探讨。更有一些地方组织和部门,把历史的夜郎与现实的经济文化结合起来,赋予“夜郎文化”较多的诠释和全新的内涵。因此,在谈到夜郎文化的时候,多是从自身的角度出发,往往片面地强调夜郎文化某一方面的属性,从而忽略了夜郎文化多元化的本质,给正确理解和认识夜郎文化造成了一定的困惑。在讨论如何寻找、识别、界定夜郎文化并将其古为今用作为一种文化资源开发利用时,对“夜郎文化”概念的充分研究和立体观察更显必然。这是一种科学的方法和态度,亦是尊重客观实际的求实精神所需。

众所周知,“夜郎自大”实际是源于《史记·西南夷列传》滇王问汉使者“汉孰与我大”之典,而夜郎侯随之亦然。也即是说滇王“自大”在前,夜郎侯“自大”在后,只不过由于历史的种种原因及多方面的因素,滇王自大渐不为人知,而“夜郎自大”则日益流传开来,遂成为家喻户晓的常用成语。

无独有偶,“夜郎文化”的提出讨论和探索寻

求,也是在相邻的滇文化、楚文化、巴、蜀等文化的影响下肇始发端的。由于周围的这些地方历史文化遗存的不断发现,特别是像云南晋宁石寨山以滇王为首的数十座滇王室贵族墓葬的发现以及随葬品中以滇王印为代表的具有强烈滇文化色彩的大量青铜器的面世,重庆巴县冬笋坝、广元宝轮院等地出土的巴人船棺葬和以柳叶形剑为特征的巴式兵器的出土;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尤其是其中的祭祀坑和蜀文化特有的青铜兽面、青铜树枝、大型人面像、人头像等代表性文物的发现,极大地刺激和鼓舞了当地的文史各界暨学者文人,掀起了对地方历史文化研究的热潮,对弘扬中华文明,探索地域文化渊源,扩大地方影响和知名度,均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在这些引人瞩目的地下发现和讨论热烈的学术氛围中,贵州的社会、历史、民族、考古等各界也不甘寂寞,于是立足自身的方地方历史文化特色,也在“夜郎”的故土上开始了对“夜郎文化”的艰辛探索和苦苦寻求。

纵观贵州对夜郎文化的研究,从时段上来看可分为前夜郎文化、夜郎国文化和后夜郎文化三个大的时间段。前夜郎文化也有学者将其列入“大夜郎”文化的范畴,着重点在夜郎立国之前,其上限可追溯至春秋时期,核心问题是夜郎文化的起源和发祥地,多围绕有关古牂牁国的主题来进行;后夜郎文化

顾名思义是指夜郎国灭亡之后有关夜郎文化的后续影响以及此后在不同时期设立的夜郎行政区域和以夜郎所命名的地点等等。前、后两段实际也就是讨论夜郎文化的源与流的问题。而关键的中心议题——夜郎的主体民族、夜郎文化的代表性特征、夜郎国的政治、经济、军事社会形态等,则集中在了史料所载的夜郎国存亡的时空范畴内,即狭义的夜郎文化抑或夜郎国文化。其起讫标志上限是夜郎作为一个地方政权的出现,有据可查最早的记载为战国晚期楚顷襄王时,遣将军庄蹻溯沅水出且兰伐夜郎,以此得知夜郎当在此之前即已存在;而夜郎政权的最终覆灭,则是汉成帝河平年间由于夜郎王兴不服从汉王朝的管辖,与周围的钩町王禹、漏卧侯俞连年兵戎相见,被汉遣牂牁太守陈立诛杀,并将欲举兵复仇的兴之妻父翁指斩首,至此夜郎不存。

在具体的讨论过程中,根据研究的材料和对象,对夜郎文化的探讨大致又可分为两个不同的发展时期。前一阶段以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为限,当时虽然在多种因素的助推下讨论得热火朝天,不乏参与的激情及大量形成文字的成果,但囿于考古学材料的匮乏以及考古学界的积极介入,基本上是处于一种纸上谈兵的模式。除了少数的文章外,几乎所有的讨论都立足在《史记》、《汉书》、《后汉书》、《华阳国志》等几部有关史籍对夜郎相对模糊和极其有限的文字描述上,争论的焦点也主要集中在夜郎的中心和都邑位于何处、疆域范围的四界及大小、夜郎的主体民族是谁等等问题以及一些具体的名称地望的考据上。这种现象延续了一段时期,由于没有更多的新材料、新观点作为支撑,便开始显得有点难以为继。

在这样的情况下,对地下考古材料的企盼和依赖变得重要起来。

1995年,贵州省成立了夜郎考古领导小组,夜郎文化专题考古研究被提上议事日程,由此开启了贵州夜郎文化研究的第二个阶段。

从这一时期起,人们把关注的目光更多地投向了田野考古所取得的成果和相关的资料信息上。

依据历史文献典籍的记载,通过考古学田野的发掘收获,加上民族学的相关材料,在较短的时间范围内,贵州又掀起了一波波“夜郎文化”研究的热潮,对“夜郎文化”的认识也从史籍的只言片语延伸到更为广泛的领域,在历史学、民族学、考古学等学科领域,均取得了一定的收获和进展。但随着发现的增多、工作的深入,对“夜郎文化”的理解和定性也

日见分歧,这种不同的观点和看法,集中体现在考古学领域显得尤为突出。

首先,较多的考古同仁用考古学研究的方法,以考古学文化的“文化”概念来看待和理解夜郎文化,把夜郎文化视为考古学范畴中必须具备共同的文化特征、分布于共同的地域、代表同一个时代的文化遗迹和遗物的综合反映。在此前提下,鉴于地下出土文物的局限、考古学田野上发现的相对偶然、有关文化遗存的缺失湮灭、已获取的实物资料的辨析认定、所掌握材料中包含的文化元素的未知因素以及不同文化成分交融折射出的多元化特征等。使我们在寻找、分析、判断研究对象是否具备“夜郎文化”的条件和要素、能否代表一个已逝的古代历史文化时,产生了较多的不确定性。

迄今为止,贵州境内关于古夜郎国存续时期(约在战国中晚期至两汉之交)这一特定时空范围内的考古发现,绝大部分分布于省会贵阳以西的贵州西部地区,其中又以黔西北的毕节地区和黔西南自治州为遗存相对集中和遗物发现较多的地点。

历年来经过发掘和试掘并被学界同仁普遍认为与夜郎文化有一定关连的遗址及墓葬,比较集中和有代表性的也仅局限于毕节地区的赫章可乐、威宁中水和黔西南的普安铜鼓山三地。

从这三个地方所见的遗迹遗物观察,其中包含的并非是一种而是几种不同风格、不同内涵的文化因素:

一种是典型的汉文化,以威宁中水和赫章可乐两汉时期的汉式墓葬为代表,有砖室和土坑两种墓型结构,随葬品中常见的陶器组合、五株钱、“张光私印”等汉代遗物,无论从墓葬还是器物形制看,都与中原地区汉墓相差无几;

第二类是贵州邻近地区古代文化的渗透,突出的有同期的“滇文化”和“巴”、“蜀”等文化的影响。例如滇式蛇头形铜剑、鼓形铜釜、戈内上饰人物图案的铜戈和大量的巴蜀式柳叶形剑等等。

第三种是目前仅发现于贵州的一些地方文化因素,最具代表性的特征像赫章可乐墓地里用铜釜罩在死者头上的“套头葬”、威宁中水出土陶器上的刻画符号、普安铜鼓山出土的大量铸造青铜兵器 and 小型工具的石范、陶模,带特殊刻符的铜钺、一字格曲刃铜剑等。

基于上述考古材料的局限性和对这些资料认识的异同偏颇,贵州考古学界对有关夜郎文化的观点和看法也产生了几种迥然不同的认识。归纳起来,大

致有下面几种不同的见解：

#### 1. “贵州古夜郎地区青铜文化”的观点

该论点的提出,主要基于两点:“根据文献资料和已发掘的遗址、墓葬、遗物综合研究”认为赫章可乐、威宁中水、普安铜鼓山“均系古夜郎国地望。其境内发现的这批墓葬,埋葬习俗特殊,出土各类器物具有强烈的地方特征。尤其是奇特的‘套头葬’,独具一格的陶器和青铜器,以及无法辨识的陶器刻画符号和青铜钺上的符号,为国内考古资料所罕见或少见,所以我们认为它是一种与汉文化、滇文化和巴蜀文化不同的文化。”同时又认为“第一,这种文化发现的地域性不够广泛,要构成一种文化,尚需发掘更多的同类型遗址和墓葬……第二,这种文化的典型遗址、墓葬和遗物发掘太少,要从考古学上正式命名为一种文化,条件尚不成熟。”“因此,我们将其定名为‘贵州古夜郎地区青铜文化’”。

#### 2. 夜郎民族墓葬的观点

1984年,文物出版社出版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的《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该书第四章“秦汉时期西南地区的少数民族墓葬”一节,明确提出黔西北的赫章可乐和威宁中水发掘出的战国秦汉墓是“夜郎”墓,认为“赫章威宁‘夜郎墓’的发掘,为探索战国秦汉时期古夜郎的文化,提供了第一批珍贵的实物资料。但是两地发掘的都是小型墓,还不足以反映当时夜郎的典型文化面貌。”

2000年元月,《考古》杂志社组织举办“中国考古新发现学术报告会·2001”。会上讨论了“赫章可乐夜郎民族墓葬的时代序列,墓葬中人骨架保存情况,四种形式的‘套头葬’的演变关系,以及这组形制及纹饰独特的青铜器的分布状况和产地问题”。再一次将贵州发现的有关考古材料定性为“夜郎民族墓葬”<sup>①</sup>。

#### 3. “夜郎”及“夜郎旁小邑”的看法

持此观点的学者认为:“根据考古学上关于‘文化’命名的原则和有关‘夜郎’历史的记载,我们认为‘夜郎文化’,是指从战国时期‘夜郎’的出现起,到西汉末年‘夜郎王兴’被杀止。在这数百年的时间内,‘夜郎’地区存在着一种具有少数民族风格的古代文化。”同时认为:“夜郎还有很多的‘旁小邑’,这些所谓的‘旁小邑’,他们的文化,可能与‘夜郎文化’区别不大,因之暂时都叫它们做‘夜郎文化’。据此观点,认为已发表的有关文物应“看作夜郎文物”,包括“夜郎旁小邑”的文物,也应“暂统于夜郎文物中”<sup>②</sup>。

#### 4. “夜郎时期文化遗存”的观点

该观点认为,应该把地域文化关系上的“夜郎国文化”与民族文化意义上的“夜郎文化”分开来,在考古学文化的定义上,应该持慎重的态度,目前“贵州所有已发现的夜郎时期考古遗存,无疑是研究夜郎历史十分重要的资料,但都不能简单化地就直接定义为夜郎文化,也不能定义为所谓夜郎文化的不同类型。”目前宜名之为“夜郎时期地方民族文化遗存”或“夜郎时期具有地方特点的考古遗存”<sup>③</sup>。

#### 5. 全盘肯定与否定的观点

全盘肯定者不仅以目前有限的材料构筑起一个完整的考古学文化上的夜郎文化体系,甚至为充分论证自己的观点,更进一步利用几个遗址、墓葬之间出土遗物一些形式上的变化,代替考古学文化类型中器物群之间质的区别,甚而还炮制出几个不同的所谓夜郎文化的“地方文化类型”,此虽然是极个别的意见,也遭到众多研究人员的反对,但负面影响不可小视。

全面否定“夜郎文化”的观点则认为,现在还没有任何直接有力的证据能证明夜郎文化的存在,要通过考古学来确立“夜郎文化”,除需要更多、更充分的考古材料外,甚至最好还要有夜郎国都城的遗址、夜郎王的金印等等一系列能直接证明夜郎文化存在的物质依据,否则就不能认同夜郎文化,不能提夜郎文化。这理由固然充分,但并不现实。因为夜郎国的城址可能早已毁损泯灭,夜郎王的金印也许早已不存,或永远不能被发现。但这并不能否定夜郎文化的客观存在,而改变夜郎文化曾经辉煌于世的历史事实。

笔者认为,考古学文化意义上的“夜郎文化”,应该只是夜郎精神物质文化遗存彰显于世的一个侧面,而不是其全貌。所以不能以考古学的概念来理解和看待多元的夜郎文化,更不能因还没有发现直接有力的证据、还没有找到典型的夜郎文化遗址和墓葬或者夜郎政权的中心都邑等就不谈甚至否定夜郎文化。夜郎文化是一个历史的客观存在,并不以能否保留下来以及是否为我们所发现而决定取舍。固有的考古学文化的建立和命名,是源于我们对所发现的对象缺乏认识的基础上用归纳法提取其代表性特征而得出的,因而常常只能用首个遗址的地名来命名,如“大溪文化”即是首先在巫山县大溪镇瞿塘峡东口长江南岸与大溪河交汇处的三级台地上发现而命名,“龙山文化”则是在山东省章丘县龙山镇城子崖首次发现而得名。但对于历史上曾经建立过地方



政权、史有所载、族可溯源的夜郎主体民族缔造的物质与精神文化遗存,不管它是否因社会或自然的因素能否传存下来以及我们是否能够发现、揭示和认识,它都客观存在于历史时空范畴内。例如巴蜀文化的提出,早在建国前就已有学者正式命名,但由于发现的材料有限,长期不被学术界认可,直到建国后有关遗址墓葬的相继发掘发现,该文化命名才逐渐广为接受,再加上引起轰动的广汉三星堆、成都十二桥、金沙遗址等一批重要遗存的发现,现在已没有任何人对这一历史地域文化概念执异议,只是随着工作和研究的深入进展,已将“巴”与“蜀”两个文化圈分别开来。所以,不能以考古发现的先决条件作要素来看待和命名夜郎文化,而是要正视、承认这一历史客观事实,科学地来考察和探讨它的外延和内涵。夜郎文化不管我们是否能发现和揭示,它都是历史的曾经、诞生相关文化元素的母体、两千年前在夜郎故地上的演绎。

如此说,并非否定考古学在夜郎文化研究中的地位和作用,我们只是藉此区别和澄清考古学文化与夜郎整体文化概念上的从属与异同关系。相反,在寻找夜郎文化的过程中,囿于文字资料记载的简芜,其他相关学科研究手段和条件的局限,考古学田野工作方法的介入、考古学研究手段的运用,则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整个工作进程的快慢,决定了对夜郎文化研究的深度和广度。

正因为建国几十年来考古工作者在贵州田野考古工作中的辛勤努力,使我们不断地从地下埋藏的实物资料中获取越来越多的相关信息,有了日积月累逐渐丰富的发现,在辨析夜郎文化因素时有了可资借鉴的标本,对研究夜郎文化勾勒出了一个大致轮廓。

实际上,不管我们怎样看待,客观存在的事实是不会发生改变的,有所不同的只是我们主观认识上的偏颇。夜郎文化已经在历史的长河中留下了痕迹,这种存在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我们赞同学术上的畅所欲言甚至交锋争论,欢迎有不同的见解提出探讨,允许不同的观点和看法并存,这些,都是为了推进研究工作的深入,促进学术的繁荣,以期通过不同的认识逐步向同一的目标靠拢。

正是由于不断深入的讨论,不同观点的交锋,夜郎文化离我们似乎渐行渐近,轮廓变得日益清晰,一个多元、立体、多侧面、多层次结构的夜郎文化,正在我们面前拨开一团团迷雾,逐步显露出其真实的面容。

从考古学意义上讲,夜郎文化是一种物质性的文化遗存,具体体现在相关的遗迹遗物诸如遗址、墓葬、城池、房屋、兵器、生产工具、生活用品等方面,通过对其代表性特征的提炼概括,揭示出该文化的具体内涵,故在未能取得丰富翔实的第一手材料时,难以得出定论。当然,这并不影响我们对具体个案的分析,对个别特征的认定。如贵州赫章可乐用铜釜罩在死者头部的独特葬式,在同时期的其他文化中就从未发现,可视为这一地方历史文化的一个代表性特征。

而从民族学意义上观察,夜郎文化则是一个典型的民族文化,是以夜郎主体民族为主,包括“夜郎旁小邑”民族在内的地方少数民族缔造的民族物质和精神文化的总和。因此,民族学对“夜郎文化”的探讨,首先是基于其文化人类学的方法和视野,在借鉴考古学、历史学等学科材料的基础上,重点研究夜郎文化的缔造者即夜郎民族的族属族源、民族文化特征、社会组织结构、精神物质文化遗存等等。

从历史学的角度去分析,夜郎文化则视为在特定的时空范畴夜郎国产生、发展、消亡的一段兴衰史。它以历史地理、史料文献为框架,融合其他相关学科的学术成果,重点考据关于夜郎国的建制沿革、疆域地望、政治军事、社会经济、人文环境等。是对战国秦汉时期分布在这一地区的夜郎地方政权的全方位探索。

撇开学科上的各有所重,从其他的各个方面来看,一个地方历史文化的结构也是多层面的。

从地域上看,夜郎文化涉及的范围有宽有窄。狭义的夜郎文化区域仅指夜郎国统辖的范围,大体在今黔西北及滇东北一带,而广义的大夜郎文化圈,则包含了现在的滇黔渝楚桂及相邻地区,可以说完全不是一个概念。

从年代上看,夜郎文化影响的时间有长有短。夜郎国的诞生约在公元前三世纪中叶至汉成帝河平年间,约二百五十余年的历史。但对于一个文化的产生消亡而言,不会就这么简单,其源与流都有一个发展阶段和延续过程,夜郎文化的形成肯定经历了其建立君国前的漫长时期,并且它的文化影响也不会随着其政权的倾覆就立刻灰飞烟灭,一定会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以不同的方式传承下来。

从表象上看,夜郎文化的特征也有强有弱。在其个性强烈的方面,夜郎民族文化的风格特点可以展露无遗,而当其与其他相邻文化发生交流融合时,这种相互间的影响造成的多文化因素就会使其自身特

点弱化。

从结构上看,夜郎文化的组成可以是一个核心民族文化,也可以是一个政权模式的集中反映,还可以是在一定范围内若干个族群或旁小邑的集合体。

从内涵上看,夜郎文化的概念亦有广有狭,其间包含了多种不同的分划与界定,不同时空条件下不尽相同的文化层面。

凡此种种,不一而足,充分说明我们所面对的“夜郎文化”,是一个多姿多彩的多元结构,不能用单一的眼光来看待,更不能固执己见,以偏概全,用个别代替一般,以局部的研究取代整体的分析,而应着眼全局,在大的框架下做好具体的每一步工作,为正确理解和全面认识“夜郎文化”作出自己的一份努力,争取将古夜郎的真实面貌展现于今人的面前。

#### 参考文献:

唐文元、刘卫国:《夜郎文化寻踪》,四川人民出版社,2002年。

贵州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夜郎考》(讨论文集之一、之二、之三),贵州人民出版社,1979年,1981年,1983年。

贵州省博物馆考古研究所《贵州田野考古四十年》,贵州民族出版社,1993年。

、 、 、 、 程学忠:《普安铜鼓山遗址首

次试掘》,《贵州文物》1985年第2期;刘恩元、熊水富:《普安铜鼓山遗址发掘报告》,《贵州文物》1985年第3期;贵州省博物馆考古组、贵州省赫章县文化馆:《赫章可乐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86年第2期;贵州省博物馆考古组、威宁县文化局:《威宁中水汉墓》,《考古学报》1981年第2期;贵州省博物馆考古组:《贵州威宁中水汉墓第二次发掘》,文物资料丛刊,1987年第10辑;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赫章可乐2000年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08年。

宋世坤:《关于“夜郎考古”的几个问题》,《贵州省博物馆馆刊》,1988年。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文物出版社,1984年。

⑪ 本刊记者:《中国考古新发现学术报告会2001》在北京举行》,《考古》2002年第7期。

⑫ 李衍垣:《夜郎故地上的探索》,贵州人民出版社,1980年;李衍垣:《夜郎青铜时代的文物》,《夜郎史探》,贵州人民出版社,1980年。

⑬ 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赫章可乐2000年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08年;梁太鹤:《夜郎文化的考古学定名问题》,《贵州文物工作》2003年第1期。

(责任编辑:周广明)

(上接第195页)

充分运用了浮雕的表现手法,将庐山秀丽的气势艺术再现在浮雕瓷板上。二是工艺性,体现在工艺上有重大突破。在当时物质及技术条件下,用柴窑烧制如此大规模的堆雕瓷,可以说是独一无二,是上个世纪50年代末柴窑烧制的大突破,其原料配方和成型制作上也是重大突破。三是历史性,体现在作品是特定的年代创作。参与者蔡寿生等都是业内顶尖高手。“历史不可再创造”,凝聚了一大批老陶瓷艺术家的心血、智慧,体现了那个时代的气息和精神。四是供求性,“物以稀为贵”,该作品作者大都已经去世,属于独一无二、绝无仅有的存世作品。作品集艺术性、工艺性、历史性于一体,因此具有极高的收藏价值,堪称国宝级的雕塑珍品。

近几年来,庐山非常重视文化建设,继续保护挖掘庐山文化遗产,力求将庐山深厚的文化内涵尽善尽美地奉献给中外游客。征集庐山风光浮雕瓷板四条屏就是其重大举措之一,既丰富了庐山文化内涵又传承了历史。今天,庐山风光浮雕瓷板四条屏静静地立在庐山博物馆的展厅里,接待着四面八方的游客,承载着宣传庐山文化、宣传景德镇传统瓷雕工艺的双重使命,这也许是它最好的归属地和价值所在。

#### 参考文献:

彭禹旺:《旷世珍品瓷令专家感到震惊》,《瓷都晚报》2005年12月21日。

(责任编辑:刘慧中)